

17.10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钟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委员会编

鍾祥文史資料

第二輯

目 录

回忆锺祥县水湖、北山等地的民主革命斗争……从克家(1)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锺祥县襄河东的党、政、

军组织情况	李金锡(15)
京锺南山革命根据地后勤工作回忆	彭刚(27)
锺西县的建立和活动情况	刘建章遗稿(37)
“豫鄂边区抗日独立游击支队”的建立和发展	韩光甸(44)
抗日时期京锺县立新民中学概略	廖运孚 冀承喜(49)
五师突围后的北山斗争形势	肖怀远(53)
挥师江汉 首袭锺祥	
——忆重建江汉根据地的斗争(摘录)	张才千(59)
李先兵日记摘抄(续二)	李先兵遗稿(63)
进军锺西北 激战快活铺	万德坤(73)
回忆张文津烈士	洪学敬(81)
南山人民怀念饶玉卿	杨介仁(86)
建国前国民党锺祥县伪政权组织及部分罪迹	关瑛(95)
“一贯道”在锺祥地区的组织和罪恶活动	罗忠福(104)
“基督教”在锺祥的活动情况简介	王中安(115)
少数民族在锺祥的发展和变化情况	王益文(121)
解放前的皇庄港	张万炎(125)
革命老同志诗词选	(130)
历代诗人咏锺祥诗歌摘抄	(139)
嘉靖皇帝朱厚熜在锺祥的发迹及其点滴所为	(143)
一、赴京承大统	张作宪 关瑛
二、南巡承天府	唐家昌
三、血泪筑显陵	李登勤

回忆钟祥县水湖、北山等地的 民主革命斗争

从 克 家

我作为参加过水湖、北山等地民主革命斗争的一兵，回顾这段战斗历程，心情总是激动的，总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情感，促使我拿起笔来疾书往事。这对于我们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焕发革命精神，继往开来，坚定四化必胜的信心大有裨益。现仅就我亲身经历的斗争史实回忆如后：

一、大革命时期的农运活动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参与下，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战争开始了。由于共产党的影响和鼓舞，北伐革命军士气高昂，势如破竹，很快攻克武汉。在北伐革命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党把钟祥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共产党员张光灿、黄鸿早、刘勋臣三同志派回钟祥（当时北伐军还未打到钟祥）。他们三人到了水湖（即今柴湖）后，张光灿、黄鸿早隐蔽到郑家集，刘勋臣到从家庙隐蔽在教师陈铭三家里。这一带开始有了革命的火种。

这三个共产党员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和我们贫苦农民渐渐熟悉了。常向我们宣传革命道理，讲解革命形势，介绍北伐情况，宣传共产党的宗旨，说明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将来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要组织农民协会，由穷人当家作主。我们听了心里都很高兴。

约在这年九月份，北伐军打到钟祥，在魏家集缴了伪团防局的枪，捉了团防局头子吴海成，抄了他的家，封了他的门，大灭

了反动势力的威风。同时，革命军纪律严明，态度和蔼，使我们深受感动，向往革命。于是，我们开始组织起农民协会。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夺取革命领导权，打着革命的旗帜，接过革命的口号，组织假农民协会，到处搭台讲演，空喊“打倒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贪官污吏”三个口号，以欺骗农民，扰乱革命阵线，达到破坏革命的目的。实际上他们根本不触动地主豪绅一根毫毛。

为了揭穿这帮假革命真反革命的面目，一九二六年冬天，共产党员张光灿、黄鸿早、刘勋臣，在鍾祥宣布成立共产党鍾祥县党部和农民协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恶霸！”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等革命口号，广大贫苦农民积极响应，各地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遍及鍾祥全县。特别是南乡的保堤观、郑堤观、靳家庙、范家庙、从家庙、杨家庙、邱家庙、郭家庙、殷家庙、王家庙、贺家庙、许家庙、关帝庙、杨家集、李家集等地的农民协会行动很快，到一九二七年农历二月，都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从家庙是重点。县党部派孙善谟同志来此地组建农会，并派季纯清、吴瑞珍同志驻会加强领导。当时分工：会长从焕章，副会长陈玉山，执行委员从克家、廖大定、陈天香，纠察队长由我兼任。

农民协会成立了，妇女协会、儿童团也相继成立，都有自己的战斗口号。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制度、恶劣习惯。农会提出“三打倒”：妇女协会提出：“禁止包办婚姻，禁止缠脚，打倒封建压迫，打倒三从四德，提倡男女平等”；儿童团提出：“禁止抹牌赌博，打破封建迷信”等。

农运的兴起，迅速冲决一切束缚在他们身上的罗网，大闹翻身解放。第一件大事，是推翻地主武装、打击土豪劣绅。一天，从家庙农会由孙善谟同志率领，我带了几十名纠察队员，持大刀

长矛，到郑家集把伪团防局武装改编为农民协会武装，由谢良佐同志任队长。接着我们带了二三十人去捉范杨家庙的大豪绅恶霸刘尧卿、刘舜卿，未获，就把刘尧卿的儿子刘协远、刘舜卿的儿子刘耀远和他们的侄子刘久远等，捉送县党部关起来，分了他们的浮财，封了他们的门。翻身农民的革命行动，如急风暴雨，席卷全县，把几千年的封建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阶级的体面威风，扫之以尽，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连县知事也俯首听命。县农会送押的人，叫关谁就关谁，叫早关不敢晚关，真正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广大贫苦农民为之欢欣鼓舞，到处唱大戏，喜庆胜利。

正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帝、官、封的总代表、中国最大的反革命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股反革命逆流，很快冲击到了鍾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红枪会”头子梁鑫田、梁鑫若、恶霸豪绅李择夫等反革命武装，疯狂进攻鍾祥县城，捣毁了县党部和县农会，杀害了县党部负责干部黄鸿早同志，同时砸开监狱，放出了被关的土豪劣绅；曾被我们改编了的武装又反戈叛变。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鍾祥。大恶霸刘尧卿当了鍾祥县清乡大队长，他的儿子刘抗远当了中队长，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农民干部、会员、义勇队员；普设关卡，禁止通行，捉不到本人就抄家、封门、拆屋，捆绑吊打家属。仅从家庙、保堤观等地就抄了上百户农会会员的家，会长从焕章的房子被拆毁，我父亲、伯父、爱人都被捆绑吊打，游乡示众。当时弄得天昏地暗，十室九空，无处存身。我和郭全山、郭全春等先后跑到京山、沙洋、张港等地，郭全春以后到沙洋隐蔽两年多才回家。虽然大革命失败了，但真正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没有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没有向他们说一句好话，保持了高尚气节，满怀信心地开展地下斗争。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敌我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革命运动虽然表面上沉

寂下来，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杀绝，更没有被征服，他们运用各种形式继续进行战斗。

1、以合法身份作掩护，打入国民党的政权、经济团体内部进行斗争。如共产党员王超群，担任了水湖地区下五保保董；共产党员茹传品任上五保保董；共产党员×××在武汉经过区乡人员训练回来后任二区区长；共产党员高子云在二区任税收主任；共产党员刘鹏洲任联保办公处联队付。我当时的任务是：为党的秘密活动站岗放哨、送信等，未直接打入敌人内部。

2、发展游击队，建立革命政权。这是随着红军巡回式的游击行动进行的。如一九二九年，红军罗汉（钟祥雨霖人）同志，同驻扎当阳的国民党左派聂豫的部队联合，攻打了当阳、荆门，活捉了两县的伪县长；又攻钟祥，再攻京山未打开，就在钟祥组织和发展游击队。一九三一年，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军，打到钟祥石碑、荆门的沙洋等地，补给当地红军游击队武器装备，在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军支持下，乘势把钟祥的襄东、襄西联成一片。同时，在南乡二区谢马家湾、襄西的北山、潘湖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还将石碑的土豪袁兴恒、沙洋的土豪陈志大等都捉关起来，令其交款取保放出。

3、利用敌人的监狱、法庭，同敌人进行说理斗争，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一九二九年从家庙地区恶霸刘炳武，霸占农民李明海的妻子廖汉生，被李将他砍了几刀未死；又因大革命时期我们抄过他的家，他就借机报复，收买司法官汪波澄，证人徐学官，诬陷我和陈天池、李明海一起要杀他，把我们三个人关押起来。在狱中，我见到不少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坚贞不屈，据理驳敌，把敌人驳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只好放了他们。共产党员江克壮同志就是突出的例子。在审判庭上，伪县长指控说：“江克壮搞革命最凶，他把‘蒋委员长’供在小手，把毛泽东供在大手。”负责主审的伪师长问：“怎么晓得？”伪县长说：“听人家说的。”伪师长又问江克壮：“这是事实吗？”江克壮说：

“湖北搞革命搞得最凶的是‘三黄’（黄安、黄冈、黄梅）、‘两圪’（圪春、圪水）、麻、罗、广，那里都把蒋介石的像放在小手，把毛泽东的像放在大手。”伪师长问：“你怎么知道的？”江说：“是听人说的。”伪师长说：“听说的怎么能作证？”江反驳说：“刚才县长说我搞革命搞得最凶，还不是听说的，为什么他听说的可以作证，我听说的不能作证呢？”驳得伪师长理屈词穷，无可奈何，只好把江放了。

4、由公开转入秘密，严厉打击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由于蒋介石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率部驻扎鍾祥沙岗，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郑家集清乡队长汤天山、苏占扬，张家集的队长张耀庭，襄西冷水的队长姚晓南等，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这帮匪贼勾结起来，从天门的渔新河、三汉潭、观音湖、拖船埠，到鍾祥的沙岗、林家集、潘家集等地铲共杀人，杀得血流成河。王家干沟烧了几十家的房子；谢马家湾有几十家被杀绝了；北山孔艾家山，一天杀了五个共产党员。红军许坤山、肖亭柱、刘纪善、许启大等烈士，都是这次被杀害的。共产党员、下五保保董王超群同志被苏占扬捕捉后两小时就杀了。同情革命的老教师王焕然，因受追捕，从冷水转移到朱家铺，才免遭杀害。当时，还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内部又清除什么“改组派”。这样，内外夹攻，使鍾祥地区的党组织受到了惨重的损失。

敌人残酷的镇压，并没有扑灭革命的火焰，动摇革命者的意志。相反地却教育、锻炼了我们，使我们意志更坚强，策略更巧妙，对敌人的打击更猛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由公开转入秘密。利用上五保保董茹传品的合法身份，在上五保一带，掌握了部分枪支。共产党员黄丁山、何天宝、孙瞎子等隐蔽在高子云家里。在高家河，地下党秘密地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有高家广、高家秀、高学道、高学吉、石新才、石典明、高庆丰、

茹传耀等加入了我们党。他们负责侦探敌情和保存枪支。对于罪恶极大的豪绅惯匪，我们在探准他们的行动后，将其镇压。先后杀了许和臣、宋振彪、黄采鲁、范继统、刘协元、苏明茂、肖品山等一批坏蛋。大恶霸李云斌藏在鍾祥城内，长时不归。一天我们探知他骑马回家，就中途设伏（在鎮滩寺，由黄丁山、康祖烈等十多人冒充钓鱼的），用渔叉把他戳杀了。这样秘密处决反革命分子，广大人民拍手称快；敌人却似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万状，反革命活动才有所收敛；有的屈服于革命压力，好言求饶。国民党县党部还通过区长×××和国民党县党部成员舒楚柏等出面调解，求情不杀。在这种情况下，敌我斗争形势稍有缓和。这些事实说明，对于反动派，我们不能表现任何怯懦，只有坚决斗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能战而胜之。

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敌我斗争并未停止，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十年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鍾祥地区也随着出现了这一新的转变。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

难忘的一九三七年，发生了灾难深重的“七·七”事变，日本法西斯发动了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侵华战争，在“百万倭寇压境，神州沉沦使人愁”的紧急关头，我们党号召和领导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时期。为了加强鍾祥革命斗争的领导，党组织派刘慈恺、黄德钦同志来鍾祥，在郢中镇中果园建立“鍾祥县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原来已在鍾祥的一批共产党员，如黄丁山、刘鹏洲、茹传品等，也同时出来活动，名义上是办合作社，实际上是办党校培训干部，发展党员，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抗日队伍。黄德钦同志在洋梓、汤池等地办过党校，各地发展了不少党员。在水湖地区活动的是共产党员何正亮等同志。

一九三八年春，黄丁山、高勋回到水湖，进行秘密活动。当时隐蔽在水湖以收税为掩护的共产党员高子云也活动起来。主要是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一九三八年十月，正是中华民族抗日危难之际，经过高子云、刘鹏洲两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永远记得入党时庄严宣读“遵守铁的纪律，死不叛党”的钢铁誓言。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仅凭义愤闹革命，而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去奋斗终身。高家河、从家庙建立党支部，高子云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廖大定同志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武汉失守后，党号召组织抗日游击队。口号是：收缴枪支，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于是，我们四处活动，搞武器，抓武装。

一九三九年农历正月十二日，日寇打到旧口。正月十三攻占了鍾祥县城，当时我们党已收集了一部分武器，成立了抗日游击队，由共产党员芦祥瑞任队长，刘鹏洲任指导员。为了团结抗日，使我游击队合法化，经县委与国民党县长交涉，将鍾祥地方武装统一编为国民党鍾祥自卫队。下属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杨海清，第二中队长王玉山，他们都是国民党的武装。芦祥瑞同志率领的游击队为第三中队，是我们党的武装。

日寇侵占鍾祥后，我们始终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寇，不断地扩大抗日地区，发展抗日力量。水湖地区，当时处在敌、伪、顽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环境艰险，情况复杂。我们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依靠群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武装起来 坚持游击战

一九三九年，日寇打到水湖。在老堤驻撤往复，到处奸虏烧杀，无恶不作。在从家庙抄家时，在高学江（后叛变）家里，发现高在地区党校学习的文件和全区共产党员名册，杀了高的弟弟高学洋，不久又杀了共产党员张兰田、方任青同志。我当时是从

家庙党支部书记（四〇年我走后是从代俊，他于四一年叛变）。为了反击侵略者，我从鬼子手中缴了一支枪，刘永胜从国民党手中缴了一支枪，高子云取出了土地革命时期藏的两支枪，一共四支枪，组成了水湖游击中队。没有枪的就背大刀、梭标，由刘鹏洲同志任队长，同敌人游击周旋。由于我们扎根人民，熟悉地理环境，往往出奇不意地袭击敌人。如一九四二年八月，水湖武装在任家滩发现日寇轮船护送一千多只民船驶向鍾祥，立即报告京鍾县委。谢威同志立即带部队在高家集、三公头之间设伏，打死打伤日寇多人，拦船两百多只，缴获酒精、布匹、牙膏等军用品一大批。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刚投降，我当时任水湖区付书记兼中队长，带着区中队的六支步枪，在尖树渡截击日寇船只，缴获布匹、军衣、医药等大批军用品，立即送到县人民政府。

对于单独活动的鬼子，我们坚决活捉或歼灭。一次在吴集坝，我们活捉了一个鬼子，缴获马拐枪一支；又一次一个鬼子闯进一个小店，枪放在门外，被跟踪的刘明清、徐为德将其打死，夺得枪支。

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加之敌人以假蔽真，有时使我情报不准，以致我军在水湖作战时，也有失利情况。如一九四二年八月，我京鍾独立团在水湖地区许家马路与日寇作战，团长彭友德同志连中十枪，身负重伤。一九四四年正月初一，日寇在水湖袭击我区中队，连长黄道德同志壮烈牺牲。一九四四年六月，水湖地区分乡书记张祖尧发现黄家岔堤有十多个鬼子，立即报告京鍾县委。谢威同志带一个连来围歼，战斗打响后，敌人冒出一百多，占了有利地形，加之武器优良，使我军十多位同志英勇牺牲。

前门打虎 后门打狼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与日寇狼狈为奸，从一九三九年起，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我们不仅要打击日寇，还要打击伪顽军。一九四一年，我五师一个团配合京鍾大队，在新魏家集同顽匪周

老八部作战，俘匪十多人，缴获武器一批。一九四一至四二年之间，襄河西塘港以上国民党河防大队长周土方，刘港地带的河防大队长杨志邦等，经常骚扰水湖地区，抓人抢劫，把我王家河支书王端云同志捉去杀害于陈集北首。我当时任水湖中队付，为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曾带五支步枪和基干队，每晚坚守河沿，战严寒，斗风雪，夜出朝隐，一直守卫了半年多。一九四二年顽匪薛胜南部驻扎水湖。经我们探明情况，报告我五师，派来一个营将其分割包围，除少数溃逃外，大部分被俘虏。一九四四年河西周土方、杨志邦匪部，又窜水湖骚扰。我们“礼尚往来”，予以“回敬”。通过张志贤、杨学福探准消息，我带区中队十五人、十支枪，利用三青团区队长陈国元的船只，打死了几名叛逃的基干队员，活捉国民党大队长杜清政、营长曹××、连长×××、保长李中清等人，立即押送到我南山司令部。司令部实行宽大政策，优待俘虏，把他们送回河西放了，杜清政在我们政策感召下，给我们送子弹、送情报，做了不少的好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刚宣布投降，盘驻在高家集和新魏家集还有一个伪保安大队。县委书记郭久恒同志写信给区委书记王森和我，令我们以党籍保证，全部缴他们的枪，不准跑掉一人一枪，任务十分艰巨紧急。我们连夜召开分乡干部会，研究部署战斗方案：第一、准备武力围歼；我带三中队和基干队设伏，化装成老百姓在田间、路边“干活”，监视敌人的行动，封锁道路，拦截敌人；第二、迅速砍断电线，切断敌人之间的联系；第三、政策攻心，以中心乡名义写信给维持会和军官，晓以利害，上午九、十点钟，敌大队长梅文杰从县返回，被我们拦截，缴了他手枪一支，当即令他带中心乡信件，回去劝降。这样，迫使梅文杰以及分乡队长夏青山等率部缴械投降，共缴获步枪三十三支，机枪一挺，手枪一只，弹药一大批。这次缴枪斗争，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镇压汉奸走狗 除掉民族败类

为了使敌人变成聋子、瞎子，我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搞掉他们的耳目爪牙，另一方面在内部清除奸细。新魏家集维持会长高学汉、付会长王润生，罪大恶极，多次带日本鬼子袭击我水湖武装。一九四二年九月，刘真同志路过水湖，我们向他作了汇报，他决定杀掉这两个坏蛋。经区委研究，由连长殷守勤同志带领分区武装和水湖武装，杀了这两个汉奸。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还先后杀了一批敌人打入我内部的情报员，在从家庙杀了李明汉、李光富、徐进仙、徐学胜等；在保堤观杀了王端金；在中心集杀了范德厚；在新魏家集杀了刘桃芝（女）。日伪区长舒楚柏，经常勾结日伪军到水湖扰乱。一九四三年，按照县委布置，我们将其母许氏、族叔舒久占、舒祚好等五人抓送县里关押，舒楚柏被迫与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求饶取保才放了这五个家伙。

在敌我斗争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叛徒对我们的危害最大，他常常起到日、伪、顽起不到的作用。如一九四四年农历冬月，京钲县委派赵正培到我们中心乡（区）任征收员，因他作风不正，我批评了他，他就投敌叛变，带日寇来捕杀我们，结果扑了空，就将征收的粮食抢走，抄了中心乡付乡长陈启云和批评过他的陈中贵的家，把我家的房子拆毁，抢走粮食家俱。我一家五口人无家可归，无粮度日。经当地政府救济，我们才渡过春荒。一九四五年，日寇未投降前，我们利用关系，杀掉了这个民族败类。

打入内部 侦探情报

一九三九年，日寇侵犯水湖地区，我们选派了一批坚强的共产党员，打入日伪内部或地方维持会，从家庙地区派了共产党员方佳青、张兰田打入维持会，后被日寇发现杀害；一九四一年又派共产党员廖大定、高庆丰、肖先炳、王瑞友、刘世俊等打入，

廖大定当了付会长。新魏家集也派了四个共产党员打入日伪青年团，都被日本鬼子发现杀害。鬼子对这些同志实行了灭绝人性的残暴手段，折磨考审，甚至用烧红的铁丝通烙小便。这些同志宁死不屈，未说出一个党员姓名，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献身，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

一九四二年，我们杀了维持会长高学汉之后，刘真同志布置物色一个维持会长。其条件：一、我控制得住；二、不刮民财；三、不派基干队当苦力；四、优待军属；五、派共产党员高明当秘书，张国公当秘员，还派入搞收税的；六、及时送情报，保证我方工作人员的安全。根据这些条件经刘真同志批准柳和卿出任维持会长。此人去后，背敌向我，使鬼子经常上当。如一九四三年正月初一，鬼子秘探贺班长到处抓我，在堤上我与他遭遇，将他打倒，正要勒死他，几个鬼子远远走来。柳和卿立即远迎指路，把鬼子骗走了。贺跑回报告后，鬼子来从家庙搜捕，村民早已远走高飞了，只把醉酒的屠户陈天芳捉去，柳即设法叫陈如何应付答辩，说明贺抢财务，做坏事，自造伤痕，欺骗“太君”等等。鬼子被骗，将贺开除了，这事才平息下来。贺被开除后，对我们十分有利，我方打入的秘侦得势活跃起来，情报灵了。遇有国民党来骚扰，柳又去报告日寇，使其互相厮杀，两败俱伤，借刀除害。

积极进行交通联络工作

一九四〇年端午节前，鬼子打过襄河，石牌等地沦陷，切断了我方河东河西的联系。这样我们水湖地区就成了沟通东西之间的重要联络站，任务十分艰巨，如传递五师印的《七·七报》、党政军信件、文电，护送过路人员，传递情报等，都要及时完成。鬼子封锁了襄河，无船过渡，我们就悄悄地把船只从柴湖抬到襄河，用完后立即抬到柴湖里藏起来。一九四三年襄西行委会被破坏了，襄西的干部、部队向鍾祥、京山南山转移，我们负责渡江、护送，并派秘密交通与在河西坚持战斗的叶云支队长、宁

玉廷政委保持联系。

不断扩军 发展抗日武装

随着敌我斗争的发展，水湖游击中队不断壮大，并且一批批地向新四军和地县武装部队输送新战士。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汤筱震同志动员共产党员带头参军，万本友和我都带头参了军，十月份我带着三中队新战士三十多人，补充到襄西独立团。当时在瓦瓷滩会到团长毛凯、政委李守宪、政治部主任刘真等，他们要我带几个人回水湖，发给三十三支枪，由何南仙任中队长，我任中队付，保持三中队番号。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又发展了几十名新战士，我把他们带到京山八字门输送到豫鄂边区部队。一九四一年元旦，在那里见到了陈少敏同志。过了些时，我又回到水湖。这样发展了又输送，输送了又发展，不断扩军，仅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就向主力部队输送新战士五十多名，当时组织上授予我“扩军英雄”的称号，奖给我金笔一支，令我任水湖中心乡长兼中队长，范美先任付队长，陈国富任指导员，下辖方寿、仁寿、同寿三个乡。

战胜困难 渡过灾荒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我们八年抗战中极端困难的岁月。一方面日寇“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一方面国民党实行所谓“曲线救国”，充当日寇帮凶；加之连年灾荒，天灾人祸并降，广大劳苦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渡过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方面坚持武装斗争，反“扫荡”、反“清剿”、反“磨擦”；另一方面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组织贫苦农民向富裕户借粮渡荒，每保借几十担，政策是有借有还。当时许超同志任区委书记，我任区长兼借粮队长，我们实行这些措施，使广大贫苦农民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对我们更加信任，对各项政策更加支持。一九四三年，在群众中分别

组织农教会、妇教会、青教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实行减租减息。教育群众把改善生活与抗日救国运动结合起来，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提高了觉悟，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积极性，使水湖地区的扩军、拥军优属等抗日救国工作都有新的起色，也顺利地渡过了灾荒。

在这艰苦的岁月，我们水湖中队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荒种地、织布、开染坊，生产自给，解决了吃饭穿衣的困难，渡过了灾关，减轻了人民负担，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建设战斗堡垒 组织相应政权

这是保证抗日斗争胜利的首要一环。从一九四〇年起，我们在各保建立健全了党的支部，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同时建立抗、伪两套政权，以适应斗争形势。抗保长（公开为我服务的）专门筹办抗日事宜，兼各保借粮队长，对日、伪、顽保持秘密身份；伪保长（暗地为我服务的）专门出面应付日、伪、顽，掩护和保障我方工作人员和抗保长的安全，当时水湖地区各保的组织情况是：

从家庙：党支部书记从代俊（后叛变）、抗保长徐学清、伪保长项家风。

新魏家集：党支部书记刘永炳（后叛变）、抗保长陈启云、伪保长刘永丰。

中心集：党支部书记范刚（后叛变）、抗保长范永勤、伪保长肖延兴。

保堤观：党支部书记兼抗保长任天成、伪保长舒祚清。

镇堤观：党支部书记兼抗保长陈国祯（后叛变）、伪保长陈树清。

老魏家集：党支部书记兼抗保长姜祖文、伪保长王光旭。

许家庙：党支部书记兼抗保长王正山、伪保长王正洪。

吴家坝：党支部书记兼抗保长郭明高、伪保长吴作森。

王家河：党支部书记兼抗保长王瑞云、伪保长苏成宽。

高家河：党支部书记高永原、保长高东成。

关帝庙：党支部书记许锡厚、抗保长×××、伪保长张祖武。

太山庙：党支部书记许光祥、伪保长×××。

在政权建设和抗日活动中，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实行“三三制”，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一致对敌。在水湖地区有鍾祥县的付参议长李宅佛、参议员李师程、刘子家、邬叔德、邬祖培、杨安国等，让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参军，拥军优属、借粮、征粮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减少了阻力，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结束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在反帝斗争中失败的历史，开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打败帝国主义列强的道路，谱写了一曲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水湖地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战胜了中外反动派，迎来了革命的曙光。八年抗战，使我们经历了严峻地考验和锻炼，也使我们从切身经验中悟明了一条真理：这就是无论中外反动派如何穷凶极恶，不可一世；无论革命的道路如何艰险曲折，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必然赢得战争，革命必然取得胜利。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正是它激励着我们在抗战以后，坚定信心，战胜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

（文字修理：夏时）

〔本文作者简介〕：从克家同志现任汉江修防处处长。在本文自述中，先后任从家庙党支部书记、水湖区委付书记、中心乡乡长、区长、荆鍾北山工委、山内区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钟祥县襄河 东的党、政、军组织情况

李 金 锡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军队节节败退，使日寇很快侵占了我们大片河山。我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奋起开展抗日斗争。当时湖北省委负责人之一陶铸同志，在毛泽东同志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利用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李范一办农村合作事业人员培训班的机会，在应城汤池筹办合作事业人员训练班，借训练班的名义，培训我们党的干部。为在襄河东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和建设革命根据地，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训练班培训的学员，有很多是北京、上海、武汉学生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如刘慈凯同志就是北京“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中的骨干，钟祥县襄河东党组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

一、钟祥县襄河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

一九三八年初，汤池合作事业人员训练班第一期学员结业后，我党鄂中特委派刘慈凯同志到钟祥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公开身份是钟祥县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刘慈凯同志到钟祥以后，积极开展活动。当时活动的范围，南至旧口，北至张集，东至东桥、陈集。在工作上，一方面找在大革命时期留下的老党员，另一方面是发展新党员。对一些有抗日救亡爱国思想的青年送到汤池训练班去学习，接受党的教育以后，发展为党员的，如张集的